

中国 文化语言学 引论

修订版

游汝杰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国 文化语言学 引论

修订版

游汝杰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 / 游汝杰著. —修订本.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2

ISBN 7-5326-1083-7

I. 中... II. 游... III. 汉语—关系—文化—研究
IV. H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6635号

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修订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875 插页1 字数 244 000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100

ISBN 7-5326-1083-7/H·144

定价: 25.00 元

再版序言

此书初版时没有写序言,现在趁再版的机会补写一篇。

在国外出版的语言学概论一类书中,常常有“语言与文化”这样的章节,但是在语言学文献里从未见到“文化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这一名称在出版物上最早见于发表在《复旦学报》1985年第三期的拙作《方言与中国文化》。该文是一本当时尚未出版的同名书稿的内容提要。我可以说是一个始作俑者。

“文化语言学”这个学科名称见诸出版物以后,有人赞成,也有人非难,有的学者则疑惑,至今仍有人认为不能成立。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二:一是除词汇以外,语言的其他方面与文化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二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并未超出中外前辈学者的研究范围,因此并无另立一新学科之必要,此类研究可以归入人类学语言学或社会语言学,不必标新立异。一个新的学科能否成立,除了本身应有充分的理据外,一要学术界公认,二要经受时间考验。所以我在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会议(1992年,西安)上曾说,将有关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暂时纳入社会语言学也无不可,重要的是务实的专题研究。不过这是就整个学科的发展策略而言的,是希望大家不要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空泛的争论之中。这并不表示我个人对文化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缺乏信心。

作为始作俑者,平心而论,在1985年之前,我曾做过多年实地调查、阅读思考和专题研究的准备工作。决非突发奇想、一时兴致提议建设文化语言学的。上述的反对意见本来就在考虑之

中。欧美语言学大师有关论著也曾搜求研读。心中没有底的只是不知道西方人类学语言学和“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有何新进展？

1988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访问一个月，阅及 Dell Hymes 主编的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等书。该系《人类学语言学》课程所用教材是 N. P. Hickerson 所著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80)。

1990年至1991年我被公派出国进修，当时我选择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除了向亚洲学系的蒲立本先生请教外，主要在人类学系选修两门课程：“人类学语言学”和“语言与文化”，包括听课、做练习和考试。老师是 Jay Powell，他是在美国读的博士，曾受业于李方桂。根据 Powell 教授发给我们的教学大纲，这两门课的主要内容如下。

“人类学语言学”主要内容：语言学导论、田野工作技巧介绍、如何选择和培训发音合作人、记音训练、音位归纳和分析、记音所得语料的形态分析、各种语言的形态分析、语义分析、长篇语料的收集和分析、历史语言学介绍、总结和考试。这门课的重点是记录、分析和整理语料的技巧。请了两位印第安人在课堂里充任发音人。主要参考书都是关于田野工作和语音学方面的。

“语言与文化”主要内容：人种语言学和人类学语言学介绍、人类学理论介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 - Whorf hypothesis)、民族语义学 (Ethnographic Semantics) 介绍、亲属称谓系统研究、宗教信仰研究、话语研究 (包括话语行为、话语环境和话语的民族特征)、学生的人种语言研究报告及讨论、民族学的方法论问题、谈话分析、非言语的交际手段。这门课所涉及的

理论问题比较多。最主要的参考书即是上述 Dell Hymes 主编的书。

西方的人类学语言学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是在本世纪初期奠定的, 虽然近年来引进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也有些扩大, 但是研究规范和基本理论并没有新的建树。国内所谓文化语言学的内涵超过人类学语言学和西方的“语言与文化”研究甚远, 只要翻开宋永培和端木黎明编著的《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就可以知道它的内容是何等丰富, 况且此书尚未包括外语学界的研究成果。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决不是仅仅限于词汇。不过这决不是认为文化语言学是“土生土长”的, 或者说应该本土化。恰恰相反, 从源流来说, 我心目中的文化语言学是西方的人类学语言学和“语言与文化研究”研究的继承和发展。文化语言学与国内流行的语言学 (linguistics) 其他分支一样, 都不是土生土长的。土生土长的是传统的语文学 (philology), 例如古代的小学。从这一观点出发, 也许可以把目前所谓文化语言学中的土生土长的部分称为文化语文学。

时世傑

写于 2001 年秋

时在香港城市大学访问

目 录

再版序言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	1
第二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目标	3
第三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方法	9
第四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源流和振兴	11
第二章 文化语言学的理念和界说	16
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的理念	16
第二节 文化语言学界说	21
第三章 语言演变的文化背景	28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共生共存	28
第二节 原始共同语的拟测和共同文化特征的追寻	32
第三节 方言的历史层次和文化浪潮的遗迹	38
第四节 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人文地理	53
第五节 语言微观演化的社会文化原因	58
第六节 方言的宏观演变的社会文化原因	62
第四章 语言接触和文化交流	75
第一节 语言同化和语言化石	76
第二节 语言的借用	81
第三节 语言的杂交	98
第四节 双语现象和双言现象	105

第五章	造词法和传统文化	109
第一节	亲属称谓的文化背景	109
第二节	若干构词法和传统观念	116
第三节	词源的追溯和文化史研究	118
第六章	人名和地名的文化内涵	125
第一节	人名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时代特征	125
第二节	地名的区域特征和文化特征	132
第三节	人名和地名的语言学问题	144
第七章	汉语与中国文学和戏曲	156
第一节	语言和文学的深层关系	156
第二节	语言的节律和文学的节律	158
第三节	汉语的特点和旧体诗词的形式	162
第四节	地方戏曲的语言问题	165
第五节	文学作品的方言成分和作者籍贯研究	171
第八章	汉语和中国传统音乐	187
第一节	语言和音乐的一般关系	187
第二节	字调和声乐作品旋律升降的关系	197
第三节	古代乐谱和古声调的拟测	202
第九章	语言和民俗	215
第一节	语言和民俗的一般关系	215
第二节	方言与民歌歌词	218
第三节	秘密语	221
第四节	语言巫术、语言禁忌、语言迷信	229
第五节	方言地理和戏曲地理	235
第十章	汉语与中国文化散论	238

第一节 汉语和汉字文化·····	238
第二节 西洋传教士和汉语方言学·····	245
第三节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若干汉语语法特点··	249
附录:文化语言学译文两篇	
种族和语言 鲍阿斯(F. Boas)著,游汝杰译·····	259
上古时代的华夏人和邻族 蒲立本(E. G. Pulleyblank)	
著,游汝杰译·····	269
初版后记·····	335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

中国文化语言学是近年来诞生的新学科。

任何学科的正式诞生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研究的对象有过某些直接或间接的观察与研究,也就是说已经有了初步认识;二是必要的人文生态环境,即学术上的需要或社会上的需要。例如社会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是许多人对语言学界只追求纯形式的研究和完全脱离社会的研究感到不满意和失望。有了这两个条件,再加上几个开拓者的努力,新学科就会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样,自然而然地诞生。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人文生态环境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们对中国语言学的所谓危机感和摆脱“危机”的责任感。

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特别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学术思想。其结果是利弊参半,就其有利的一面看,积累了大量用音标记录下来的语言材料,并且促使中国语言学现代化;就其弊端来看,由此产生下述两大后果:

第一,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这样不但割断了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并且使语言学应有的实用或应用的价值大为降低。中国传统的小学,就其通经致用的初衷来说,其价值远远胜过现代舶来的语言

学。小学能够助人读古书、写古文,但是现行的语法,对于读古文或写今文作用甚微。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曾期望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能大大促进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但是现在看来,它的作用远不如原来想像的那么大。倒还是利玛窦的《西儒耳目资》以来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对普通话的教学工作有些助益。虽然今天的语言学常常自诩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但是国内知识界的普遍感觉是,现代的语言学是不知用处何在的可有可无的冷门学科。而在高等学府里,语言学“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境遇也已司空见惯。

第二,西方的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语研究的基础上,而汉语跟印欧语大不相同。汉语的特点是单音节语素,在句法中语素的独立性较强。以语法研究为重心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从马建忠《马氏文通》比附拉丁葛朗玛,到王力参照叶斯柏森“词三品”说,到现行的种种语法论著,大多只是移入西方的理论、术语、概念和方法,不少地方难免削足适履或者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虽然文法革新派早已看出“照抄照搬”的弊病,但是积重难返,汉语语法学在因袭的重负下,至今依然是步履维艰,异见歧出。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语法学的困惑”,而且在语言学别的领域也有类似的困惑。

由于上述两大弊端的发展,中国现代语言学越来越萎缩,而不是繁荣;语言学家越来越躲进象牙之塔,而不是走向广阔的天地。在 50 年代,现代汉语的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和描写方言学,由于适应了当时的人文生态环境,曾经有过它们的黄金时代。今天的语言学只有加以革新,才能适应变化了的人文生态环境,才能摆脱自身的困境,才能自立于人文科学之林。

革新语言学似乎可以从下述三方面着手:第一,把语言学从

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既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中研究语言,也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且不仅仅停留在“研究”上,还要使语言学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第二,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第三,把语言学 and 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近年来,关于把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已经讲得很多,但是把语言学和别的人文学科结合起来却完全被忽视了。上述第一方面大致相当于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我们构想中的文化语言学的内容则大致包含在第二、三方面中。

第二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性质和目标

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如果把语言学分成解释性的和描写性的两大类的话,那么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与心理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而不与描写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处于同一个层次上。

人类语言的性质是多方面的,所以必须从多角度研究,才能全面地把握它的性质。文化语言学只研究语言的文化内涵,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它不把语言的生理性质、物理性质、符号性质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中国文化语言学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在宏观上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语言和方言生成、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在微观上从文化背景出发,寻找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各方面特点形成的原因。这样,我们就把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

起来,把语言学和人文历史、人文地理、文学、戏剧、音乐、民俗等结合起来,既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来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也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去解决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的积极创造,那么语言就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创造。语言的诞生使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发生剧变,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关键。语言是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文化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现象一般说来只有共性,而没有民族的个性。文化现象虽然也有共性,但是更重要的是民族的或区域的个性。例如化学反应中西一律,但是绘画风格中西迥异。因此研究自然现象的学科四海咸宜,但是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却不能强求一律。我们说语言有民族性或个性,并不否认人类的语言有共性,并不反对在寻异的基础上,在更高的层次上求同。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中国语言,特别是汉语,并不以研究人类语言的共性为己任。但是由于汉语是人类语言之一,所以我们在研究汉语的时候当然也有可能发现人类语言的共性。例如研究汉语的字调和乐调的关系,有可能为人类的语言和音乐的关系的共性,提供证据。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把现成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语言的共性。因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包括哲学)及其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所以需要考虑西方的理论有哪些是适合汉语研究的,哪些不适合,哪些适合的程度有限。下面举两个例子:

上海方言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有两种,一是词汇表达法,二是变式表达法。变式表达法又有后加法、前加法和扩展法三种。

例如形容词“硬”，后加法是“硬绷绷”（程度较弱）；前加法是“绷绷硬”（程度较强）；扩展法是“石骨铁硬”（程度最强）。变式表达法的语法范畴貌似英语形容词的“级”（degree），但是英语形容词的“级”有形态变化，规律性很强，吴方言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并不如此：第一，只有一部分形容词有前加、后加和扩展形式，并且每一种形容词变化的类型也有限制，大多只能跟其中的一二种类型匹配；第二，每一种变化类型所适用的形容词也很有限，如“绷绷”只适用于“硬”，“簇”或“簇簇”只适用于“新”。吴语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并不像英语形容词那样，能够类型化，从而归纳出较整齐的规则。所以英语的“级”这个语法范畴，完全不适合吴方言研究。

欧洲 19 世纪盛极一时的历史比较法，为原始印欧语的拟测和系属归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西方，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也因此得以确立。历史比较法早就被引进用于汉藏语系的比较研究，但是至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从事的人较少、记录的材料不足等之外，还得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历史比较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汉藏语系。

我们认为历史比较法不大适用于汉藏语系，理由如下：

第一，古代汉藏人的文化背景和印欧人不同。历史比较法是建立在原始印欧人大规模集体迁徙这一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的，亦即建立在语言的谱系树分化的假说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人口迁移是蔓延式的，不像欧洲的畜牧社会常常需要大规模的长途迁徙，所以汉藏语系未必呈谱系树型分化。民族或民系的杂居、交融、接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语言的宏观演变并不一定是印欧语言的谱系树型的。（此说参见桥本万太郎《语言类型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年。余志鸿译）

第二,汉藏语的历史文献就语种、数量和年代的久远而言,都远远不及印欧语言(见表 1.1,表中列出两大语系文字的种类及现存文献的最早年代)。汉藏语系的文字种类是列举(不包括彝文、壮字、水书及清代以后创制的苗文等),印欧语系只是举例而已。

表 1.1

汉 藏 语 系		印欧语系(举例)	
甲骨文	前 14 世纪	Hittite	前 17 世纪
藏 文	9 世纪	Greek	前 8、9 世纪
西夏文	10 世纪	Pali	前 5、6 世纪
缅 文	11 世纪	Iranian	前 5、6 世纪
泰 文	13 世纪	Sanskrit	前 4 世纪
傣 文	13 世纪	Gothic	4 世纪
		Amenian	5 世纪
		Tocharian	7 世纪
		English	7 世纪
		Celtic	8 世纪
		Slavic	9 世纪

汉藏语系中的汉语甲骨文虽然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但不是表音的,西夏文也不是表音的。另四种表音的文字中,傣文的创制时代虽然被学者们推定为 13 世纪(据罗美珍《西双版纳傣文》,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但是明确注明年代的最早的傣文文献,是晚至 1800 年抄刻的。所以对于构拟古代语音来说,较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实际上只有藏文、缅文、泰文三种。文献的短缺大大增加拟测工作的困难。而印欧语系的文献不仅种类多,历史久,并且同一个历史时期往往有兩種以上文献可资比较,这是印欧语系历史比较取得成功的重

要条件。

第三,历史比较的重点,一是比较形态,二是比较基本词汇,以求出语音对应规律。从印欧语的立场看,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是形态变化。汉藏语缺少形态,因此只能从基本词汇的比较入手。欧洲语言的历史比较最重视的基本词汇是数词和人称代词。古代印欧人的经济核心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往来,数词的稳定性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比较数词容易获得成功。汉藏语的数词并不稳定,不少语言中的数词明显借自汉语,如泰语、壮语中,只有“一”是本族语固有的,“二”以上即借自汉语。其他所谓“基本词汇”也并不怎么稳定,往往很难辨别同源词和借用词。这又给比较工作带来困难。

第四,印欧语中每一个词常常至少有两个或三个音节,又有形态变化,因此确立同源关系和语音对应关系较为可行、可靠。汉藏语的语素多是单音节的,且无形态变化,音韵结构又普遍较简单,音韵面貌的相似或“对应”难免带有偶然性,所以往往很难严格地作出同源关系的证明。所以 A·Meillet 说:“对于这些语言,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方法不可。”(《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 34 页,科学出版社,1957 年)

鉴于上述原因,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法很难完全搬来研究汉藏语系。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也许只能在较低的层次上进行,如构拟一个方言、一个语言或一个语族的原始语,至少在现阶段只能如此。笔者认为,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出发,汉藏语系的历史语言学应充分注意研究语言的借用、杂交、底层、类型演变等问题。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中国语言学不能全盘西化,下面举例说

明中国文化背景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研究方言地理学必须考虑它的文化背景。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关系很大。研究汉语方言地理的人不难发现:旧府州辖境内的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这样的例子各地都可以找到,如浙江的温州府、江苏的徐州府、上海的松江府,其方言的内部一致性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特点来考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历代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承平时代一般百姓都安居乐业,厮守田庐,乡土和宗族观念很强,除非有战祸和天灾的威胁,都视离乡背井为畏途。另一方面,我国自秦代就开始实行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其历史之悠久、区划之严密、管理之有效,为世所罕见。旧府(或州)是一群县的有机组合体,府治即是一府的文化中心。在农业经济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大都不超出本府之外。上述两方面的文化背景自然使得一府之内的方言趋向一致,因此历史行政地理还可以作为拟测古代汉语方言区划的重要线索。此外,在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也可以把历史行政地理列为重要的参考项,在府境长期稳定的地区尤其应该如此。笔者曾发现宋代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区划,事实上有不少重合之处。

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研究语言和方言,建立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实际上还有不少领域有待开发或进一步开发,例如中国文化的固有特点和汉语语法特点的关系、中国古代逻辑特点和汉语语法特点的关系、底层文化和底层语言的关系、地方文化和人名地名的关系等,至于婚姻制度和亲属称谓、文化交流和外来词、民间心理和忌讳造词法等则是过去已经研究较多的领域。